

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发展与落差

——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
比较研究(1840—1949)

戴鞍钢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洋货与土货:中外贸易的开展	1
第一节 国门圯塌与对外通商	1
第二节 通商口岸的地域分布	8
一、沿海沿江	8
二、内陆边地	35
三、东西部的“自开商埠”	57
第二章 耕与织:农业和手工业的演变	66
第一节 农产品的商品化	66
一、中外贸易的刺激	66
二、口岸城市的带动	78
三、农产品商品化的波动	81
四、西部的阻力和歧路	91
第二节 耕作技术和经营方式	102
一、近代工贸的推动	102
二、新式农垦企业	106
三、西部的困境	116
第三节 城乡手工业的兴衰	130
一、生产结构的演变	130
二、东西部的差异	146

2 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

第三章 资金与技术:工业的投资	160
第一节 近代工业的起步	160
第二节 外来投资的重心	185
一、外国资本	185
二、华侨资本	200
第三节 工业的地理分布	211
第四节 西部工业的转机和困顿	233
第四章 新的驱动力:交通业的举办	259
第一节 轮船的运营	259
第二节 铁路和公路的开筑	283
第三节 交通变革与经济变迁	302
第五章 市场与流通:商业和商人的活动	322
第一节 东西部间的商品流通	322
一、初级市场和长途贩运	322
二、埠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	343
第二节 商贸交易与区域经济	367
一、内外贸易商品的流转	367
二、商品运销线路的变化	377
三、西部的市场交换形态	385
第三节 新旧商人的嬗变	392
一、新式商人的崛起	392
二、东西部商会的比较	409
第六章 新的气象:城市和人文环境	416
第一节 近代城市的兴起	416
第二节 新式教育的开展	444

第三节 近代科学和文化的传播.....	463
第七章 呼声与回应:朝野人士振兴实业和西部经济	
的方案.....	476
第一节 发展实业的方略.....	476
第二节 从洋务到新政.....	484
第三节 实业计划与西北开发.....	498
征引文献举要.....	523
后 记.....	554

表 目

表 1-1 上海、广州丝、茶对英出口量(1843—1856 年)	24
表 1-2 上海、广州对英进出口贸易总值(1844—1856 年).....	24
表 1-3 厦门港的外国米输入	31
表 1-4 西藏亚东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1895—1902 年)	44
表 1-5 清末俄商、英商在新疆南部的土货收购	45
表 1-6 清末新疆四道的外国商民	46
表 1-7 晚清新疆四道的对俄贸易	46
表 1-8 中国各口岸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1870—1913 年)	47
表 1-9 主要口岸在中国各商埠输出入贸易总值中 所占比重(1936 年)	48
表 1-10 清末民初自开商埠情况	58
表 2-1 自上海出口茶叶数量统计(1845—1858 年)	82
表 2-2 英国茶叶消费量中印度茶和华茶所占百分比	

4 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

(1875—1886 年)	84
表 2-3 中国出口茶叶价格指数(1873—1891 年)	85
表 2-4 1912 年各省农牧垦殖公司统计	107
表 3-1 英国在华企业投资地域分布(1936 年)	195
表 3-2 外国在华企业投资业别统计	196
表 3-3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国别统计	197
表 3-4 沪、闽、粤三地近代华侨投资规模比较 (1900—1949 年)	204
表 3-5 华侨投资上海各行业统计(1900—1949 年)	205
表 3-6 甲午战争前各行业第一家设立资本 1 万元以上 的民用企业(以成立的时间先后为序)	212
表 3-7 中国民间资本企业的地域分布(1895—1913 年)	215
表 3-8 外商银行在华地区分布(1936 年)	222
表 3-9 全国银行分布及人口、土地分布比较(1936 年)	224
表 3-10 上海 13 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	225
表 3-11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的工厂企业	227
表 3-12 中国银行汇兑总额中口岸城市与内地城市所占 比重(%) (1932—1934 年)	232
表 3-13 抗战时期(1937—1939 年)入黔企业行业类别	237
表 3-14 1944 年云南全省工业统计(手工业未计)	238
表 3-15 甘肃工业资本各行业所占比例(1943 年)	244
表 3-16 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西部地区省别、业别统计 (1945 年 7 月 1 日)	248
表 3-17 战前、战后工业的地区集中情况(以华厂职工数 为例)	257

表 4-1	进出上海港船舶总吨位(1844—1899 年).....	263
表 4-2	上海港内河小轮船注册统计(1901—1911 年).....	270
表 4-3	陕南陆运脚力调查表(1932 年).....	282
表 5-1	国内埠际贸易主要商品运销线路	344
表 5-2	上海港入口鸦片数量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1847—1860 年).....	348
表 5-3	上海港转口鸦片数量(1871 年、1881 年、 1894 年)	351
表 5-4	1899 年江北段运河货运统计	382
表 5-5	1900—1949 年华侨投资上海商业分类情况统计	407
表 5-6	1912 年各省绅商人数的估计	413
表 6-1	1865—1895 年上海等城市新办报刊种类统计	466
表 6-2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提问者地区分布	466
表 6-3	1891—1900 年中国各地历年出版的中文报刊 统计	467
表 6-4	全国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分类统计(1940 年).....	471
表 6-5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籍贯分布	473
表 6-6	1948 年中国工程师学会上海分会会员籍贯分布	474

前言

以往国内外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研究,或侧重东部及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或侧重各省区的个案研究^①,对地域广阔的西部地区经济状况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有力推进,对近代以来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颇多^②。

① 前者较有代表性的如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美〕施坚雅主编,陈桥驿等译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后者如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地区,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等。

② 通史类著作如该书编委会:《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苗普生等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综合类著作如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炼成主编:《历史与希望——西北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专题类著作如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程雨辰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转下页)

但总的说来,大多还是侧重于对各省区的具体研究,对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发展的梯度差异及其成因的研究尚少^①。即使有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也是侧重对当代社会经济的研究,或是对中外之间的比较研究^②,尚无对近代以来中国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综合性比较研究的成果^③,有碍对近代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接上页)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 2004 年版)、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① 即使一些跨省区的研究,也多或侧重东部或侧重西部,前者如陈支平等主编:《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张利民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等,后者如马敏等主编:《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等。

② 前者如王崇举等:《东西部开发比较及西部大开发战略抉择》(重庆出版社 2003 年版),其是由国家科技部于 2000 年以软科学研究项目立项,着力点是当代的东西部开发比较研究,又如由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杜平主编的《中外西部开发史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共约 51 万字,论及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西部开发的史实,再如何顺果主编的《比较开发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2 年版),共约 48 万字,是北京大学 985 工程项目之一,分别论及中国古代的屯田制、古代西方的殖民和开发活动、美国西部拓殖的历史与经验、加拿大的开发与崛起、澳大利亚大陆的开发、俄罗斯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当代高科技革命与智力开发。

③ 2004 年 8 月在太原举行的首届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 26 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社会史中的区域界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区域比较问题,主要仍是大区域内的比较,如近代江南与淮北、明清闽台社会的比较等。详可参见张俊峰等:《首届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此前 2002 年 8 月在银川召开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撰文《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中美西部开发模式比较研究刍议》,陈育宁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亦未论及近代中国东西部的比较。

现实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中国地域辽阔,在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区域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客观存在,其中尤以东西之间的大地带性差异最为突出,这直接制约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已及时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本书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近代中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及其成因,从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等方面,作具体深入的考察研究,以期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多重因素,为尽快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支援和建设方案,提供历史的借鉴。

本书研究的重点,一是自然地理条件与东西部发展的关系。这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问题。自然地理条件,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能促进或延缓社会生产发展,并影响产业的布局。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角度考察,东西部在气候、地质、地貌、水文等方面,各有特点,相对而言,西部所受的制约更大。在科技水平低下的近代中国,这种制约尤为明显。粗放型的农牧业和交通闭塞,影响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阻碍西部经济的发展,与东部的差距拉大。这都需要条分缕析地研究剖析。二是社会环境与东西部发展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东部地区较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较早受到冲击和趋于分解,在社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为新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条件,这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习俗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有具体表现;而西部则相对滞后,旧的社会结构和传统很少受到冲击,阻碍了新的社会进步因素的输入和传播,削弱了东西部发展的联动效应。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三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这是以往较少论及的问题,本书拟从考察东部各沿海城市在近代以后所发生的城市结构变迁和城市功能拓展切入,分析其在东西部社会、经济、文化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4 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

和作用,剖析东部沿海工业城市与西部农业乡村之间的经济辐射和集聚的互动关系,并揭示其历史的局限性。

本书研究的时限,暂定为1840年至1949年,并根据史实论述的需要,适当上溯或后延。空间范围,东部是指京津所在的河北(曾称直隶)、山东、江苏(包括后设市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西部是指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甘肃、陕西、宁夏等省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武装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状况,需另作专题研究,暂不列入考察范围。

本书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将依据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实地调查考察相结合,重视定量分析和整体研究。资料方面,在充分利用已出版的中外文献资料的同时,努力挖掘各地未刊档案资料、各地旧海关资料和乡土资料,力求在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前提下,依据扎实的资料和科学的方法,对以往较少触及或回避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章 洋货与土货 :中外贸易的开展

第一节 国门圯塌与对外通商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主要是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陆路贸易。早在秦汉时在边境上与邻国的货物交换就已存在 ,当时称之为互市。到汉武帝时期 ,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商务往来更趋频繁 ,丝绸之路一直通达东罗马帝国。据史书记载 ,隋朝时中央政府已经有了互市监的设置 ,但有关这方面的正式制度规定没有系统的记录。到了唐代 ,除西北地区的陆路贸易继续有所发展外 ,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 ,于是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后 ,海上贸易的地位渐趋重要 ,乃至超过了陆路贸易^①。

清嘉庆中叶后 ,清皇朝的统治日趋衰弱。统治者却依旧自诩“天朝上国” ,虚骄自大 ,闭目塞听 ,面对不断前来叩门和骚扰的葡、英等国 ,不是采取积极应对的举措 ,而是不思进取 ,故步自封 ,不愿了解外部世界 ,拒绝与外部世界接触 ,采取了愚昧的闭关政策。

清初 ,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清朝政府以沿海居民与洋商杂处 ,必致滋事为由 ,规定只在广州一地 and 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 ,又被清朝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 ,

^① 王玉茹等 :《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0 页。

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这些特许的行商。这些享有特权的行商一方面设置垄断性的商业机构,凡是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也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到政府的委托,执行政治上的职能,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行商转达。所以,行商实际充当了清朝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清朝政府旨在利用行商避免与外商发生直接关系。

为了限制外国人的在华活动,清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诸如禁止外国人长住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于外商,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自由走动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不相交结。对中国货物的出口,也有严格的限制,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废铁)、硫磺、硝等物,均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数量均有限制,同时禁止茶船出海贸易,闽、浙、皖等地所产茶叶,必须由内河过五岭运赴广州,通过行商卖给外商,如直接出海贩运,则被视为“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充公。清政府还严格限制中国商人翻造海船,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18尺,载重不得超过500石,舵工、水手等人不得超过28名,并严禁将所造商船租于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严禁中国商人在外国打造商船,带回中国^①。

究其根源,闭关政策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里,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即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

^① 详可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页。

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人们与市场的联系,是相当有限的。这种落后闭塞的经济形态,是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乾隆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就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①这种自大闭关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反映。

同时,闭关政策也是清朝政府维持其统治的政治需要。正如戴逸所指出的:清朝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同样是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船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18世纪后期,中国古代社会已处于衰世,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政府由盛转衰,暴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当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策略,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所以,它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

闭关政策的推行,后果是严重的。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

^①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33,第8页。

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力量的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①。

当清朝政府还沉湎于虚骄的“天朝上国”的幻想中时,域外的世界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处于迅速上升阶段,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它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在 18 世纪末,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进入 19 世纪后,英国的工业发展更快。1771 年(乾隆三十六年)至 1775 年,英国加工的棉花约 500 万磅,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已达 52 800 万磅,猛增 100 余倍。1795 年(乾隆六十年)煤的产量为 100 万吨,到 1836 年增至 3 000 万吨;1796 年(嘉庆元年)生铁的产量是 125 000 吨,到 1840 年增至 139 万吨。英国的机器制造业发展也很快,重要的生产资料已都由机器生产。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大变革,铁路和轮船投入使用。英国的出口总值也由 20 年代初期的每年 3 000 余万英镑,增加到 30 年代后期的每年 5 000 余万英镑,其中棉织品的输出占全部出口总值的五分之二以上。因此,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便成了英国资本家的强烈欲望。

^① 戴逸:《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6 页。

紧随英国的,是法国。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起,工业革命在国内全面展开。首先采用蒸汽机的是棉织工业。到1830年(道光十年),法国工业应用蒸汽机的数量还仅650台,1839年即增至2450台。1825年铁的产量为20万吨,到1840年为35万吨。1830年煤的产量为180万吨,到1841年为300万吨。1788年毛织品出口总值为2400万法郎,1838年增至8000万法郎,从1815年(嘉庆二十年)至1840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3倍。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独立战争后掌握政权的。1814年(嘉庆十九年)美国出现第一家新式棉纺织厂。1822年(道光二年)棉织工业中心罗威尔开始建立纺织工厂,到1834年该地纺织工厂增加到19家。从19世纪30年代起,工厂开始广泛设置蒸汽机。1840年棉纺业中开动的纱锭为228万多个。其工业产量,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和法国,位居第三^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急切要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便成为它们觊觎的主要目标。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占63.3%。以后,英国对华贸易持续上升。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输入值的90%左右,从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输出值的70%以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每年抵达广州的英国商船常有数十艘,1826年(道光六年)曾达85艘,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国家^②。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曾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

①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第12~13页。

②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页。

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这个使团由于觐见的礼仪问题,同清廷争执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被清廷逐回。

1831年(道光十一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发生了议会改革。原先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被打破,工业资本家进入议会。接着,根据议会的决议,英国政府在1834年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任何英商都可以自由去中国进行贸易。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措施,也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以前,中英双边贸易是由两国的商业垄断机构——中国的行商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媒介而进行的,英国在华的商务代表由东印度公司派人充当,称“大班”、“二班”,他们必须按照清朝政府在闭关政策下形成的一套规则章程办事。而在这以后,英国政府就直接派遣“驻华商务监督”,代表英国政府同清朝政府打交道。后起的英国工业资本家和那些得以自由来华贸易的商人,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极为迫切。而驻华商务监督也和过去的大班不同,他们比后者更傲慢,更强硬,更不接受清朝政府和行商的约束。相反的,他们要踢开行商,直接同清朝高级官员接触交往,实施他们的扩张要求。中英关系因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矛盾冲突日趋频繁。

1840年,英国侵略军的炮火强行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格局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以后陆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各种特权。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在中外交往方面,丧失了主权地位,从而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列强在中国取得的特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沿海和内地通商口岸贸易权。口岸通商原是国际贸易的

常例 , 应由本国政府根据需要自行决定。但鸦片战争后陆续开辟的一些通商口岸 , 则是在列强的压力下 , 被迫开放的。

广州很早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自 1757 年清朝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 , 除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外 , 中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广州一地。《南京条约》结束了广州独占对外贸易的特殊地位 , 规定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等五个口岸对外通商。外国人在这些通商口岸享有自由贸易权 , 可居住和设立栈房、教堂等。

二是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海关是国家的大门。关税的税率 , 是一个国家用以限制或鼓励某些进出口商品 , 以便保护本国工商业利益的手段。在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 , 必然根据本国的利益自主订立关税税则。然而在鸦片战争后 , 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 , 侵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

《南京条约》规定 , 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项规定使中国的海关丧失了自主权 , 成为一种“协定关税”。在 1843 年 7 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 , 中国关税税率被极力压低 , 规定进口货物税率 , 大体在 6% 上下 , 比鸦片战争前大为降低。如粤海关实征税率 , 1843 年以前 , 本色洋布每匹税率为货价的 20.74% , 1843 年新税率是货价的 5.56%。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 73.19%^①。这自然有利于外国商人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 , 明文规定了值百抽五原则 , 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又比 1843 年降低 13% 到 65% 不等。

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 , 列强蓄意乘机谋取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借口战乱拒纳关税 , 并与美国驻华公使相勾结 , 宣布上海海关实行“领事代征制” , 即由英、美驻沪领事代替中国海关向其本国商人征收、保管税款。次

^① 严中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 第 59 页。